

试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 共产国际决策的关系

王 文 杰

(长沙铁道学院社科部)

摘 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所犯错误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陈独秀错误的理论基础的产生、政策的形成和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剖析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革命指导方针、政策的错误,以探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共产国际决策的关系。

众所周知,陈独秀从党的“三大”开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为止这段时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为什么会从“三大”后一步一步地滑入右的泥坑,史学界对此意见不一。本文试图从陈独秀错误的理论基础的产生、政策的形成和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剖析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指导方针、政策的错误,来说明它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and 环境之一。

(一)

一般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形成于1923年,其标志是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篇是《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两篇文章中,陈独秀轻视和贬低中国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①陈独秀在贬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又极力吹捧和美化中国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②陈独秀的这些错误观点仅仅是他个人的,还是遵循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是我们分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我认为,陈独秀上述两篇文章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

本文于1987年6月11日收到

最明显的是1922年冬天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同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但这次会议却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忽视了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所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就是一个否定东方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纲。它强调工人运动“年轻”，无产阶级组织“处于萌芽状态”，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③大会闭幕后，由陈独秀带回国的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独立的工人阶级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④这些观点，我们从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可以找到。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文化程度低，整个阶级的组织程度也很差，^⑤“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⑥他还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毫无根据的抨击，说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⑦马林甚至断言，它“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⑧马林在低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的同时，又过高估价国民党的力量。他认为，无论从国民党的党纲、组织成份来看，还是从国民党的政治态度考察，国民党都是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而且与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的性质相似，是一个由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的联盟”，根本否认国民党内存在的右翼势力和地主军阀的残余。

马林的报告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和批准。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以及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估价，与马林的观点完全一致。从这些决议里我们可以看出马林观点的投影。马林给共产国际造成的“第一印象”、由于受到以后来华使者对中国情况的类似观点的“验证”，多多少少一直延续下来，而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上下级关系，又使它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见解反过来长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的政策。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和退让就是例证。

(二)

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政策形成的突出事例。但是，退让的造成，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都是有责任的。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是资产阶级右派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第一个反革命阴谋事件。蒋介石之所以敢于一手策划这一阴谋事件，除了有利时机以外，还因为蒋介石已被鲍罗廷捧上了最有力的领导地位。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的当天，鲍罗廷把蒋介石推上握有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四天后，蒋介石又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这一切，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书记陈独秀并不知道。但蒋介石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伙同国民党右派加紧了争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为了粉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当时在广东的党中央委员以及广东区委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根据当时情况，这个计划完全是可以付诸实行的。但是，在上海的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魏经斯基片面地认为郭松龄倒戈的失败，表明革命处于低潮，主张采取退让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中央党团书记张国焘贯彻退让方针。结果，把蒋介石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造成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创造了条件。

“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①事件发生时，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仑都不在广州，指挥处理“中山舰事件”重任是由刚到广州不久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顾问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布布诺夫使团负责。16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却说蒋介石是“忠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②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还致电蒋介石，仍然幻想同他实现“革命力量的团结”。^③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没有从此认识到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的错误，他们继续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和冯玉祥。共产国际把汪精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还把他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断言武汉的左派国民党起了类似“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④至于冯玉祥，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

“共产国际……相信他是农民领袖”。^⑤实际上当时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起反击。虽然共产国际发出的“五月指示”是想挽回大革命失败的局面，但是，“五月指示”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极其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或那种实质上必然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立场”。^⑥这说明共产国际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仍然是汪精卫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国际代表罗易为了取信于汪精卫，甚至干出了这样的蠢事，把“五月指示”的副本交给已经作好叛变革命准备的汪精卫，从而为汪精卫实行公开叛变提供了口实。可见，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同陈独秀一样对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作了错误估计，采取了右倾麻痹、盲目依从的态度，丧失警惕，放弃斗争，使中国大革命陷于失败的境地。

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的错误也是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密切联系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只发展国民党的力量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力量。“中山舰事件”后，有人建议请苏联把供给蒋介石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遭到了拒绝。共产国际解释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⑦直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5月底，共产国际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提拔一批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来；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五万工农来组编几个新军；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来制裁同蒋介石勾结的反动军官。这三项指示中，第一、三两项是只有取得汪精卫同意以后才能做，而汪精卫是决不会做的；第二项，共产国际指示中也是要求这支新军应作为武汉国民政府“可靠的近卫军”来组织的，而不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来组织的。在共产党已无力抵制汪精卫日趋反动的情况下，“五月指示”要在中国得到贯彻执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发出，六月才到达中国，这时中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失败的边

缘!当然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较之它以前的政策还是大进了一步,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挽救中国革命的时局,却已无所补益。

在农民土地问题上陈独秀犯有严重错误,这也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伐之前,共产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个农民运动高涨的革命形势。北伐开始以后,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这时,共产国际发往上海的一个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②6}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但是,会议对如何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是不明确的。共产国际只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勇敢地发展土地革命,但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莫斯科写这项决议是轻巧的,但要应用于中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在研究如何具体实现土地革命时,以布布诺夫为团长的使团是“不同意反击的”。^{②7}他们在震惊之余,开始对蒋介石意向进行试探,当得知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复时,如释重负。3月24日,在布布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顾问团会上,作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全面妥协的决定。布布诺夫使团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就离开广州,返回莫斯科。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州,“首先与蒋氏晤谈”,^{②8}“对蒋介石采取了(并让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了)和解的态度”。^{②9}并同蒋介石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其要点是:“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采取措施约束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提出的主张,采取措施对付党的右翼;鲍罗廷明确表态支持北伐战争。”^{③0}为了切实贯彻上述妥协政策,鲍罗廷于4月底、5月初数次约当时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谈话,明确表示:如果因为“三·二〇”事件而使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受损,“莫斯科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将难于交代”,因此希望中国共产党“多多配合”,绝不要与“国民党中派势力决裂”。^{③1}由于苏联顾问对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力量大大削弱,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中共党员都被撤出来。于是,第一军就完全为蒋介石所操纵,成了他建立军事独裁的工具,为他进一步篡夺国民党党权铺平了道路。

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据蒋介石回忆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是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③2}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很快报到了上海,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是不同意默许的,但是都不起实际作用。当时,陈独秀主张反击,但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其原因就是共产国际不许。他在1929年12月的《告全党同志书》里追述这件事时说:“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大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③3}6月4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完全接受了“整理党务案”。可见,不论是陈独秀还是魏经斯基、鲍罗廷,都是向蒋介石退让。他们对国民党右派的让步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纪律”吗?没有。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不要夺取领导权,即“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③4}决议把蒋介石划为中派,对他只能批评,即“彻底批评在左派和右派间之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摇动的中派。”^{③5}事实证明,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都是执行了这些政策的。其结局是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利用工农、实现了他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目的。从此以后,“蒋介石包揽了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③6}

(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是大革命的最后时期。这一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右倾麻痹，丧失警惕，造成“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失败。这些都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系的。1927年初，蒋介石正准备公开背叛革命之际，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发表文章，对资产阶级右派有可能叛变革命只字未提。3月6日，蒋介石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开始了公开反共。可是，在讨论3月的问题时，引起了国际代表之间和中共党内的激烈争论。

1927年4月1日，新的国际代表罗易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发生“政见冲突”。鲍罗廷主张立即无条件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带着推动革命任务来华的罗易反对此主张，认为现在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最初，中共中央大多数人站在罗易一边，通过了罗易提出的立即进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但是，两天以后，撤销了这个决议。在中共五大会上，罗易与鲍罗廷再次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冲突。会上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反映出力求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共五大闭会没有多久，发生了“马日事变”，当时的共产党人准备反击，迅速集结了一支农军，打算进攻长沙。然而，鲍罗廷、陈独秀都制止进攻，听任他们和唐生智和平解决。罗易则主张武装农民同许克祥军队进行一次实力较量，不同意鲍罗廷采取协商解决的办法。他将这个问题报告莫斯科，斯大林回电象中共五大的决议一样，在罗易和鲍罗廷两人观点之间求平衡，试图调和两种不相同的主张，要求中共支持唐生智的军事进攻，同时在武汉政府地域发展革命运动。鲍罗廷和罗易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农民土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被搁置了，陈独秀是站在这两个争论着的共产国际代表之间，但倾向于鲍罗廷。

(四)

从上面所列举的历史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错误的造成，除主观原因外，客观上与共产国际及其来华代表进行错误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否认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影响，不仅不利于对陈独秀的全部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不利于总结历史教训。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之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一些领导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情况，单凭几条固定不变的理论去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经常以俄国的经验，机械地搬来指导中国党的活动。这就使他们在看待中国革命时缺乏远见，而对国民党的背叛，感到震惊，束手无策。第二，共产国际在远离各国实际的中心指导各国革命，这就很难从各国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加上它和各国党的关系是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错误的决策也可以从组织纪律上强调要各国党贯彻执行，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不能不犯错误。第三、共产国际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理论上的分歧、政策上的经常举棋不定，和共产国际来华的代表经常意见不一，这些矛盾纠缠在一起，致使我国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还不能决断方针政策，搞得陈独秀等人无所适从，大革命失败已是意料

之中。

当前，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征途中，认真吸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注

①②《前锋》第2号：《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社会各阶级》。

③④②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第70—73、76、313、327页。

⑤⑦⑧《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12页。

⑥转引自〔美〕罗伯特·诺恩、津尼亚·尤丁：《罗易赴华使命》第20页。

⑨⑬⑭⑳㉑《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大事提要》（1919—1943年）第50、130、131、153、157页。

⑩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22页。

⑫〔西班牙〕弗尔南多·克劳丁：《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第10页。

⑮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十三节。

⑯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395页。

⑰⑱《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151页。

⑲《吴玉章回忆录》第136页。

㉓《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0页。

㉔《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